

《尚书·禹贡》所载中国古代农业知识的译介及其西传

沈思芹^{1,2} 钱宗武¹

(1.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1500; 2.徐州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禹贡》是中国最早的政史经典《尚书》的名篇之一,其对中国古代农业知识的记载,也是中国最早的农业史料。西方对《禹贡》的译介历时久远,翻译了有关中国古代土壤辨识、农业特产、农赋等级、桑蚕养殖、水土治理等农业史料,其形态包括译文与注释,注释部分内容丰富。因时代与译者的原因,译介有些全面细致,有些较为简略,有些亦有讹误。这些译介是西传最早的中国农业资料。相关研究对于中西农业交流史、中国农业文献史等研究皆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禹贡》;《尚书》;中国古代农业;英译;重农主义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3-0043-11

The Transla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al Knowledge in *Yugong of Shangshu* and Its Spread in the West

SHEN Si-qin^{1,2} QIAN Zong-wu¹

(1. College of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1500;

2.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Xu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uzhou 221000)

Abstract: *Yugong* is one of the famous works in *Shangshu*, the earliest classic in China, and its record of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al knowledge is also the earliest agricultural historical data in China. *Yugong's* English transl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in the west. Its translations introduce agricultu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ancient Chinese soil identification, agricultural specialty, agricultural tax grades, silkworms breeding, soil and water control, etc. The forms include translations and annotations, and the annotations are rich in content. Due to the times and the translators, some of the translations are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some are brief, and some are erroneous. These English translations are the earliest Chinese agricultural materials transmitted to the West. The relevant resear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documents in China etc.

Key words: *Yugong*; *Shangshu*;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e; English translations; physiocratism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最重要的政史经典,《尚书》的《禹贡》等篇章留下了中国古代先民农耕知识的最初记载。这些记载不仅随着中国历代学者的诠释而流传后世,也随着明末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的来华

[收稿日期] 2019-12-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12&ZD15);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7YYB014);江苏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

[作者简介] 沈思芹(1973-),女,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徐州工程学院副教授,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钱宗武(1952-),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尚书》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与语言学。

及其对中国核心典籍“四书”“五经”的学习和译介而开始西传。《尚书》最早的西语译本为意大利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t, 1577-1628)1626年的拉丁文译本,早期的译本主要还有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和宋君荣(Antione Gaubil, 1689-1759)的法文译本等。这些早期西传的农业知识和资料引发了西方对中国当时先进的农业的学习和效仿。随着其后不同时期西方《尚书》新译本的行世,《尚书·禹贡》所载中国古代农业知识,逐渐得以更为全面、准确地西传。这些西传的农业史料,对中外农业史等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尚书·禹贡》所载中国古代农业知识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度,华夏也是最早发明服务于农业生产二十四节气的民族,虽然管理国家的圣王贤臣和著书立说的知识分子多重重视论述道、术、器、势、法,传世的最早典籍没有农书,但是,构建中国最早知识体系的元典处于农耕社会的历史大背景,自然不可能离开农业,农业知识的记载以及涉农史料屡见篇什。唐朝著名的史学家彭城(今徐州)刘知几的《史通》称《尚书》为“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精此书,次览群籍。”^①《尚书》保存了“轴心时代”中国古老文明之初丰富、厚重的社会、思想、文化、历史等诸多领域的原初要素,是政史著述的源头要籍,也是农业史料的滥觞。《尚书》因其重要的价值而深受西人的重视,成为最早被西方译介的经典之一。

(一)《尚书·禹贡》所载中国古代农业知识及其研究概况

《禹贡》以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尚书》的名篇之一,记载了上古夏王朝开国君主大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②的伟大功绩,“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制度、行政区划、山川分布、交通物产、水土治理、贡赋等级等情况”,是“最早最有价值的地理著作”^③,西人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自然地理考察著作”^④。历代对《禹贡》的研究也多在地理学领域展开。如《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历代地理专著都以其为依据。“汉代以来,研究《尚书·禹贡》的著述不下数百种,蔚然成为专门学问”^⑤。民国以来亦有诸多研究涉及《禹贡》的成书时代、九州区划、导山导水、地名考释、贡赋、五服制等方面^⑥。

“《尚书》的核心思想是‘敬天’‘明德’‘慎罚’‘保民’”^⑦。农业是封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命脉,“保民”的根本即在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农民的利益。《尚书》的诸多篇目皆有关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记载,如《虞夏书·尧典》篇:“乃命羲和,亲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于是尧帝命令羲氏与和氏,严肃谨慎地遵循天数,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历法,把天时节令告诉人们^⑧)最早记载了勤劳智慧的先民为了把握农时,如何确定二十四节气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区分四时;如何制定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按照时令来进行各项农事,观法天地,总结其间的规律与农事的关系,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古代在以农桑为主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再如《周书·吕刑》篇:“禹平水土,主明山川,后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广雅·释诂》:“农,勉也。”《尚书今古文注疏》:“殖者,《文选·藉田赋》注引《仓颉篇》云:‘种也。’嘉谷者,谓稷,今之小米也。”^⑨谷,《说文·禾部》释为“百谷之总名”。《今古文尚书全译》译

① [唐]刘知几著,张振珮笺注:《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9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第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43页。

③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④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科学出版社,1976年,第14页。

⑤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48页。

⑥ 容天伟、汪前进:《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⑦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2页。

⑧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2-5页。

⑨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抗、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525-526页。

全句为“大禹平治水土,负责名山大川的治理,后稷教民播种,努力种好庄稼。”^①《禹贡》篇则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上古农业知识。《禹贡》的第一部分关于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的假想行政区域的划分,其实是根据山川区隔、气候分布标准划分的不同农业区域,具体叙述各个农业区域的土壤土质、桑蚕养殖以及农业赋税的等级,再从各州农业赋税的等级,具体说明各个农业区域的主要农产品的情况,经由历代学者持续不断的研究与注解,逐渐拓展、丰富了有关古代农业的诸多知识信息。

《禹贡》作为中国最早的传世政史文献《尚书》中的一篇,其中亦载有中国农业的早期生产实践与知识经验。学界已有一些从农业视角的研究,主要有王光玮对九州土壤的分布及其变迁情况的分析^②;陈恩凤的《中国土壤地理》对《禹贡》各州土壤、田赋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解释^③;万国鼎对中国古代土壤种类及其分布进行了研究^④;邓植仪探讨了中国上古时代农业生产中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⑤辛树帜《禹贡新解》对《禹贡》所载九州之“壤”“坟”“垆”“塗泥”等特征之土所在区域与地形进行了考证分析,并考察了古人的有关释义^⑥。崔增磊、赵慧对《地员》与《禹贡》所载的土壤学知识进行了比较研究^⑦;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多为对表示不同土质的词语进行文献考证,分析其意义、特征及地理分布等,对于《禹贡》所包含的中国古代农业思想与知识的研究尚显不足,未见对其进行对外传播尤其是译介与西传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从西方汉学的视角,考察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对《禹贡》的英译,分析其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的译介与《禹贡》西传的特点,以期拓展《禹贡》的研究领域,也为中国的农业史、中西农业交流与传播等研究提供资料与参考。

(二)《尚书·禹贡》所载古代九州土壤的分辨及其价值

农业离不开对土壤的认知,中国智慧的先民们很早就有五方五色土的概念,东方青色,南方红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禹贡》的九州不仅仅记载了九州的土色,还系统细致地记载了九州土壤的治理、肥力、性质和等级划分。现主要依据历代学术界形成共识的主要注疏:汉代孔安国的《孔传》;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简称《孔疏》;宋代蔡沈的《书集传》,简称《蔡传》;清代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历代字书词书以及当代学者的《尚书》著述,对《禹贡》文本的有关内容归纳并解释如下:

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即“这一带的土是白壤”,“土质是第五等”^⑧。《禹贡》将赋税和土质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上上是第一等。唐代学者颜师古注:“柔土曰壤。”汉代孔氏曰:“无块曰壤,水去土复其性,色白而壤”^⑨。

兖州:“桑土既蚕”,“厥土黑坟”,“厥田惟中下”。即“能够栽种桑树的地方都已经养蚕”,“这里的土质又黑又肥”,“田地是第六等。”坟,汉代经学家马融解释为:“有膏肥也。”^⑩汉代经学家郑玄注:“其地尤宜桑蚕,因以名之。”^⑪

青州:“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意思是:“这里的土又白又肥,海边有一片广大的盐碱

①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346-349页。

② 容天伟、汪前进:《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③ 陈恩凤:《中国土壤地理》,商务印书馆,1951年,第30-39页。

④ 万国鼎:《中国古代对于土壤种类及其分布的知识》,《南京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

⑤ 邓植仪:《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农业生产上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土壤学报》1957年第4期。

⑥ 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127-171页。

⑦ 容天伟、汪前进:《民国以来〈禹贡〉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⑧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50页。

⑨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6页。

⑩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51页。

⑪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抗、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48页。

地”，“这里的田是第三等。”斥，汉代经学家郑玄解释为：“斥，谓地碱卤，”^①《说文·土部》：“卤，碱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②

徐州：“厥土赤埴坟”，“厥田惟上中”。即：“这一带的土是红色的，又黏又肥，”“这里的田是第二等。”^③埴，《孔传》：“土黏曰埴。”^④

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即：“这里的土是潮湿的泥，田地是第九等。涂泥意为潮湿的泥土。《史记集解》引马融说：“渐洳也。”^⑤《孔疏》：“润泽之处，故为渐洳”^⑥。

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其土如扬州。即：“这里的土是潮湿的泥，田地是第八等。”^⑦

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即：“这里的土是柔软的壤土，土的下层是肥沃的黑色硬土，田地是第四等。”^⑧垆，《说文·土部》：“黑钢土也。”^⑨马融注：“豫地有三等，下者坟垆也。”^⑩

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即：“这里的土是疏松的黑土，田地是第七等。”青黎：青，指黑土。黎，疏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黎之言离也。”段玉裁用声训的方法说明黎黑土离散、疏松的特征^⑪。

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即：“这里的土是黄色的，田地是第一等。”^⑫宋代学者蔡沈的《书集传》指出：“黄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贵。雍州之土黄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⑬

这些关于中国古代九州土地的记载，展现了古代中国人的农耕知识和经验，是古代农业生产实践的最早记录，反映了在古代农业生产中，先民们对不同区域土壤的性质、颜色、肥瘠结构的松紧、宜种植作物等已经有了诸多的认知，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在传世文献中第一次提出“盐碱地”的概念，指出青海海边是广阔的盐碱地。第一次记载种桑养蚕，说明兖州适宜种植桑树，兖州的老百姓已经开始懂得养蚕缫丝了。《禹贡》属于今文《尚书》中的篇目，虽然学术界对其写作年代还有争议，但文献的真实性为世公认，这些宝贵的记载是不可替代的农业史料。

(三)古代各地农业特产的记载

古代的赋税不是货币赋税，是实物赋税，《禹贡》所载九州的贡赋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不同地区的农业特产，各地的贡赋等级、各地的农业、林果业特产以及农业的衍生产品的情况，如下(表1)：^⑭

| 州名 | 农产品 | 贡赋等级 |
|----|----------|---------------|
| 冀州 | 无 | 上上错(第一等夹杂第二等) |
| 兖州 | 丝、织文(彩绸) | 贞(下下,第九等) |

①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抗、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52页。

②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52页。

③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53页。

④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48页。

⑤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60页。

⑥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53-54页。

⑦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53-54页。

⑧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57页。

⑨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0页。

⑩ [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1页。

⑪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57-58页。

⑫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58-59页。

⑬ [宋]蔡沈著，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⑭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49-59页；陈抗、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136-183页；[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6-151页。

| | | |
|----|---------------------------------------|----------------------|
| 青州 | 絺(细葛布)、岱猷丝(泰山谷的丝)、泉(大麻)、縠丝(柞蚕丝) | 中上(第四等) |
| 徐州 | 峯阳孤桐(峯山桐木),玄纻(黑丝绸)、缟(白绢) | 中中(第五等) |
| 扬州 | 筱(小竹)、簠(大竹)、木、桔柚、卉服(草编衣服) | 下上(第七等),上错(夹杂第六等) |
| 荆州 | 椴、干、栝、柏、菌簠(细长的竹子)、楛、匭(杨梅)、菁茅、玄纁(彩色丝绸) | 上下(第三等) |
| 豫州 | 泉(大麻),絺(细葛)、纁(苕麻)、纻(绸)、纡(细绵) | 错上中(等二等夹杂第一等) |
| 梁州 | 无 | 下中(等八等),三错(夹杂第七、第九等) |
| 雍州 | 无 | 中下(第六等) |

由上表可知,中国古代除贡赋中没有农产品的州之外,其余各州所进贡的农产品主要为蚕丝、木材、竹子、草编、水果之类。九州之中有兖、青、徐、荆、豫五州贡赋中包含丝制品,这几个州的土质分别为“黑坟”、“白坟”、“赤埴坟”、“涂泥”、“壤、坟垆”,由记载可知,这些土质和当时经过治理的环境已较适合栽桑养蚕,蚕丝及其制品成为这些州的特产,因而作为贡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①。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古遗址中发现古代丝织品,这证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即从事桑蚕与纺织^②。“衣以桑麻,养以五谷”^③早已成为古代中国的生活图景。《尚书·禹贡》对古代九州贡赋的记载也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桑蚕养殖业遍及南北各地;作为贡赋,蚕丝制品的种类也较为丰富,如“丝”、“织文”、“縠丝”、“纻”、“缟”等,可见古代的纺织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禹贡》对于古代桑蚕养殖的记载也是中国最早的有关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世界对古代中国的了解,特别是西域西方世界对古代中国及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了解,主要的媒介物就是丝绸。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名著《中国》把起源于西汉“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1913年,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沙畹把兴盛于隋唐宋明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的海上通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生产和古老的蚕桑业对古代中国国家影响力的伟大贡献。现代“一带一路”的构想也基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中国古老的农业生产和古老的蚕桑业对现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伟大的历史贡献。

《尚书·禹贡》所载贡赋分为九等,其划分与制定方法体现了古代农耕社会的重农、保民思想。贡赋的等级表明,国家对其的制定并非完全根据土地的等级和肥力,而是还要根据实际的农业生产情况。如所载兖州的情况是:“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这表明兖州之田虽然是中下等,即九等中的第六等,但是兖州地处“河下流之冲,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剧”^④,于是管理者根据“土旷人稀,生理鲜少”^⑤的民情,在耕作十三年之后才使之与其他各州适用相同的贡赋法则。英国传教士译者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在译文注释中对当时制定赋税的规则进行了评论:“尽管该州的贡赋少,但这是恰当的,因为在对国家的治理上,赋税愈低对人民愈公正。”^⑥再如,有的州田地状况虽好,但由于人力、物力的投入不足等原因,农耕情况可能不理想,因此,尽管土地肥力等级较高,但贡赋等级却较低,如幽州的田地肥力为第一等,贡赋却是第六等。有关记载和资料也为古代农业史、农业经济学等研究提供了早期珍贵的资料。

① 张芳、王思明:《中国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第49-58页。

② 郭文韬等:《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③ 中国文史出版社编:《二十五史(卷一)》,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24页。

④ [宋]蔡沈著,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⑤ [宋]蔡沈著,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第45页。

⑥ W.H. Medhurst. *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6, p.92.

二、中国古代农业知识的译介与西传

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即开始与东亚、中亚、西亚等地贸易往来,不仅将中国的丝绸、茶叶、水稻、大豆等传播到中、西亚各国,也将中国的文化和农耕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地。13世纪至14世纪中叶,随着元代蒙古族的兴起,东西方交往频繁,东方知识随之传播到欧洲,随着元代的衰落及明代对西方基督教的排斥,东西方的交往受到阻碍。15世纪,来自西方的使者和旅行者将中国称为契丹,他们向西人记述了自己对中国的见闻和印象,尽管有些并不属实。16世纪,由于西方航海技术的发展和东方航线的开辟,以及宗教改革中耶稣会等东方传教组织的出现等,中西的交往有了新发展^①。西方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和介绍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向西方传播。

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用拉丁文首次翻译了“四书”^②,他们还将《尚书》为首的“五经”作为研习汉语的教材,并对其进行译介。意大利耶稣会士金尼阁早在1626年即用拉丁文翻译了《尚书》,之后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和宋君荣也都用法文翻译过《尚书》。18世纪西方综合介绍中国的著述,如西方汉学名著《中华帝国全志》等中也包含关于中国古代农业的专题介绍,如关于中国的桑蚕业技术的介绍等,在其第二册的英译本中可见专门章节“中国人的丝绸生产”(Of their Silk - Manufacture),介绍了黄帝的妻子西陵为丝织业的创始人,当时还用丝来祭祀“上帝”,“中国被称为丝之国(China may be called the Country of Silk),其丝织品供应亚欧各地。”^③随着这些西人对中国典籍的不断译介,中国古代农业的有关信息和知识在西方广为传播。

(一)《尚书·禹贡》所载桑蚕养殖的译介与西传

中国古代农业的有关记载,主要经由来华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的译介,而逐渐全面准确地展现在西人的面前。试以《禹贡》在西方的英译为例,考察中国古代农业知识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形态。

在汉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尚书》西方英译本主要有英国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1846)、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的译本(1865),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的译本(1950),以及英国当代汉学家彭马田(Martin Giles Palmer, 1953-)的译本(2014)。这些西方译者对《禹贡》篇的翻译并不相同,对其中有关中国古代农业知识的译介也各具特点。

历史上西方《禹贡》的英译对中国古代桑蚕业的记载进行了传译,翻译的准确度总体上逐渐提高,传译的内容更加丰富。例如关于古代九州之一兖州的桑蚕业的记载“桑土既蚕”的译介,麦氏的译本翻译为:“The mulberry ground having been supplied with silk-worms”^④,(桑土已经养蚕,括号内译文为笔者所译,下文同。)但其后的理氏译本指出其译法不当,应该译为“The mulberry grounds were made fit for silk-worms”^⑤(桑土已被治理得适合于养蚕)。

麦都思和理雅各都在注释中进一步说明了有关养蚕情况。麦氏的注释说蚕习性厌湿,故水退之后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影印版,1989年,第58-60页。

② 张西平编:《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19-120页。

③ R. Brooke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ing 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Chronological, Political and Phys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ese-Tartary, Corea and Thibet. Including an Exact and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ir Customs, Manners, Ceremonies, Religion, Arts and Sciences. The whole adorn'd with Curious Maps, and Variety of Copper Plates.* Done from the French of P. Duhalde, Volume 2 of 4 volumes. (The first edition, 1736.) The third edition, 1741, pp.355-358.

④ W.H. Medhurst. *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6, p.91.

⑤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99.

可以养蚕,并说明兖州的土地适合栽种桑树^①。理氏的注释则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补充介绍了兖州以桑树和蚕著称,尤其是一个叫做“濮”的地方,《乐记》载有“桑间濮上之音……”^②高本汉 1950 年的译文为:“The mulberry grounds were stocked with silk-worms”(桑土被养殖了蚕)^③。但其注释并未进一步说明句中的土壤和蚕的情况;彭马田 2014 年的译文为:“Mulberry bushes grow here now。”(这里现在长着桑树丛)^④,可见其只讲了栽桑,并未提及养蚕。由他们的译介情况可见,与麦都思、理雅各、高本汉的译介相比,彭氏显然忽略了桑蚕业生产有关情况的译介;再如,扬州的贡赋中有“纁”,理氏注释为:“是‘绛’的另一个名称,这种丝在染色液里经过了三次浸染。”(“纁”is another name for“绛”. The silk has received three dippings in the dye-fluid)^⑤理氏注释进一步补充了有关文本中关于当时桑蚕丝生产工艺的介绍,再现了中国古代悠久而领先的桑蚕业生产技术。

(二)《禹贡》所载九州田土知识的译介与西传

不同时期西方英译本对于《禹贡》篇所载各州的田地土质、颜色等的译介情况如下(表 2):

表 2 西方对中国古代九州土壤的英文译介

| 古九州名 | 土壤性状 | 麦氏(1846) | 理氏(1865) | 高氏(1950) | 彭氏(2014) |
|------|---------|--|--|---------------------------------------|---|
| 冀州 | 白壤 | white clay (白色粘土) | Whitish and mellow (带白色、松软的) | white and mouldy (白色、腐土) | white clay - good (白色粘土) |
| 兖州 | 黑坟 | a black loam (黑色壤土) | blackish and rich (带黑色、肥沃的) | black and fat (黑色、肥沃的) | rich and dark (深色、肥沃的) |
| 青州 | 白坟、海滨广赤 | a white loam (白色壤土) waste and briny (废物和盐水) | whitish and rich (带白色、肥沃的) | white and fat (白色、肥沃的) | white - along the coast, salty (白色, 沿海岸为盐渍的) |
| 徐州 | 赤埴坟 | red and clayey but fertile(红色粘土、肥沃的) | red, clayey and rich (红色、肥沃的粘土) | red, clayey and fat (白色、粘土的、肥沃的) | red clay and abundant flora(红色粘土、丰富的植物区系) |
| 扬州 | 涂泥 | Muddy (多泥的; 泥泞的) | miry (泥泞的) | miry (泥泞的) | Muddy (多泥的; 泥泞的) |
| 荆州 | 涂泥 | Muddy (多泥的; 泥泞的) | miry (泥泞的) | miry (泥泞的) | Muddy (多泥的; 泥泞的) |
| 豫州 | 壤、下土坟垆 | clayey, of a loose mould (粘土、疏松、腐烂的) | mellow; low place: rich /dark and thin (松软的; 低地: 肥沃的/黑、薄的) | mouldy, fat and black (松软腐烂的, 肥沃、黑色的) | clay with loam in lower regions (粘土、低地为壤土) |

① W.H.Medhurst. *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 1846, p.91.

②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101.

③ Bernard Karlgren. *The Book of Document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0, p.14.

④ Martin Giles Palmer. *The Most Venerable Book(Shang Shu)*.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14, p.90.

⑤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106.

| | | | | | |
|----|----|----------------------------------|----------------------------------|-------------------------------|-----------------|
| 梁州 | 青黎 | slatish and black (微暗蓝灰色和黑色的) | greenish and light (带绿色的、松软的) | bluish black (带青黑色) | black (黑色的) |
| 雍州 | 黄壤 | yellow clay (黄色粘土) | yellow and mellow (黄色、松软的) | yellow and mouldy (黄色、松软的) | yellow (黄色的) |

由上表可知,西方的译者在对《禹贡》的翻译中,传译了古代中国九州土壤的质地、颜色等主要特点,他们的有关表述有所不同,有的较为全面细致(如麦氏、理氏、高氏),有的较简略(如彭氏)。这些西方译者有的还在其译文的注释中对有关土壤的情况给予了进一步的说明,如麦氏在译文注释中介绍了冀州的“白壤”：“当土没有结成块时称之为粘土(clay),软的腐土也叫粘土(p.85)。他还转译了《周官·大司徒》中关于周朝的政务大臣将壤分为十二类,根据不同的土壤性质指导农民进行不同的耕作,以及区分了五种谷物和九类田地,并根据土地特点来征收贡赋。中国古代农耕中首先要区分不同的土类,但辨别土地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辨别其颜色,如白色等,其次是辨别其性质。此外,麦氏还译介了宋代著名学者蔡沈有关古代田地治理养护之法的注释：“盖草人粪壤之法,驛刚用牛,赤缙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粪治田畴,各因色性而辨其所当用也。”^①即用草木灰和人畜粪便相混合的方法,浅红而坚实的土质用牛粪,深红的用羊粪,肥沃的土地和湿软泥泞的土地用麋鹿的粪来治理,并指出:可见中国人根据土地的颜色和特性进行耕作和治理土地^②。麦氏注释青州海滨之盐渍土:“这种盐土能够被蒸煮制盐。”理氏也作出此类解释,并指出:“古代青州素有盐、鱼之利,至今仍出盐。”^③麦氏注释徐州的土质:“当土黏时称之为粘土,又如油脂一样滑,被敲碎后,可以用模具将之制作成器皿,”^④对“黄壤”的注释为:“黄色是土之恰当颜色,雍州之土为黄色粘土,耕作用土远超其他各州。”^⑤理氏在译本注释中介绍了土地特征,指出“壤”指的是土质,引用了汉代孔安国的注释“无块”与《说文》的注释“软土”对此作出说明,并对当时的农业生产特点作出说明:“土地的产出影响因素除了土质之外还包括人口密度、灌溉系统、土地治理等。”^⑥如理氏注释荆州之土时指出:“同样为泥泞的土地,荆州之土比扬州高了一级,但其贡赋却高出很多,我们可以推测这是由于人口密度较大的缘故。”^⑦高氏在其有关注释中引用了汉代经学家马融的注释,说明“坟”等于“膏”,土质肥沃。他还比较了孔安国对“坟”的注释:“起”,认为《周礼》中“坟壤”等同于马融的注释,即土质松软、肥沃。他还纠正理氏对梁州之土“青黎”的翻译:“依照前文本对土质的描述,以先说明颜色再说明质地为惯例,‘黎’应为质地,或许应为疏松,段玉裁断言‘黎’同‘小疏’,而理雅各翻译为浅色(light),没有例证支持其说。”^⑧由此可见译者对原文信息的求真精神,这有利于有关信息更为准确的传译。

综合《禹贡》的这些英译文本,可见通过对中国典籍的译介,西人译者向西方传播了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辨别土质、水土治理,依据土壤特质播种作物等知识,较全面地将我国年代久远的农业知识传递到西方。

① [宋]蔡沈著,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② W.H.Medhurst. *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1846, p.85.

③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 Vol. II & Vol. III.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103.

④ W.H.Medhurst. *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1846, p.95.

⑤ W.H.Medhurst. *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1846, p.107.

⑥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 Vol. II & Vol. III.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97.

⑦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 Vol. II & Vol. III.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115.

⑧ Bernard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48, No. 20, 1947-1948, p.152.

(三)《禹贡》所载九州农产品的译介与西传

西方早期对于《禹贡》所载农产品如丝、丝织品、竹子、水果等译介如下(表3):

表3 《禹贡》所载农产品的主要英文译介

| 古州名 | 农产品 | 麦氏(1846) | 理氏(1865) | 高氏(1950) | 彭氏(2014) |
|-----|---------------------------------------|--|---|---|---|
| 兖州 | 丝、织文(彩绸) | silk, stuffs of various colours(丝、不同颜色的东西)(p.92) | silk, woven ornamental fabrics(丝、纺织品)(p.99) | Lackquer and silk, patterned woven stuffs(丝、有花纹的编织物)(p.14) | dyes, silks(染料,丝绸)(p.90) |
| 青州 | 絺(细葛布)、岱畎丝(泰山谷的丝)、泉(大麻)、屨丝(柞蚕丝) | grasscloth, silk and hemp from the valley of the Taé mountain, wild mulberry and silk(草布、来自泰山的丝和麻、野桑树和丝)(p.93) | fine grass-cloth, silk, hemp from the valley Tae, the silk from the mountain mulberry(岱山细草布、丝、麻、山桑丝)(p.102) | fine cloth, the Tai valley's silk, hemp, mountain-mulberry silk(细布、岱山丝、麻、山桑丝)(p.14) | matting; silks; hemp, silk comes from the tribe of the Laiyu(编织物、丝、大麻、来渝部落的丝绸)(p.90) |
| 徐州 | 孤桐(峰山桐木)、玄纻(黑丝绸)、缟(白绢) | single-stemmed Dryandra, black silks, chequered sarouets(独枝干油桐、黑丝、方格的织物)(p.96) | solitary dryandra, deep azure silks, other silken fabrics, chequered and pure white(孤立的油桐、深天青色丝、其他纯白格纹丝织品)(p.107) | solitary t'ung trees black silk and fine-textured white silk(孤桐树、黑丝、质地细腻的白丝绸)(p.14) | special wood from Yi mountain(峰山特种木材) (“玄纻缟”漏译)(p.91) |
| 扬州 | 箬(小竹)、籊(大竹)、卉服(草编衣服)、桔柚 | small and large bamboos, grass-cloths, smaller and larger oranges,(大小竹子、草做的衣服、织纹装饰的丝、大小橘子)(pp.98-99) | bamboos small and large, garments of grass, small oranges and pumeloos(大小竹子、草做的袍子、小橘子和柚子)(p.111) | fine and coarse bamboos, grass garments(粗细竹、草衣)(p.14) | bamboo; from the island people-matting; silk(竹子、岛民的编织物、丝) (“桔柚”漏译)(p.91) |
| 荆州 | 柃、干、栝、柏、菌簠(细长的竹子)、栝、甌(杨梅)、菁茅、玄纁(彩色丝绸) | The wood of the Hun tree for bows, cedar, cypress, the Kwán-lǒ bamboo, Hoo wood, pandanus, black and red silk(制弓的木材柃树、雪松、柏树、菌、簠竹子、栝木、露兜树、黑色和红色的丝)(甌未译出)(p.110) | Ch'un tree, wood for bows, cedars and cypresses, the wood of the hoo tree, K'wán and loo bamboos, the three-ribbed rush, deep azure and purple silken fabrics(制弓的木材柃树、雪松、柏树、菌、簠竹子、栝木、三脊茅草、深天青色和紫色的丝织品)(甌未译出)(p.115-116) | Ch'un, kan kuo and po trees, kün and lu bamboos, the hu trees, three-ribbed mao-grass, dark and purple stuffs(柃、干栝和柏树、栝、柏、菌簠竹子、栝树、三脊茅草、深色和紫色的丝织品)(甌未译出)(p.15) | various specialist woods; bamboo and the rare Hu wood, pandan, richly coloured silk(各种特种木材、竹子、露兜树、多彩的丝)(贡赋“菁茅”、“甌”漏译)(p.91) |

| | | | | | |
|--------|--|--|--|---|---|
| 豫 州 | 枲(大麻)、 絺(细葛)、 纻(苧 麻)、纡 (绸)、纡 (细绵) | hemp, the tiner and coarser kinds of grass- cloth, coloured flos-silk and silky cotton(麻、比较 粗糙的草布、彩色丝绵) (p.102) | hemp, a finer hempen cloth, coarser hempen cloth, fine silken fabrics, fine floss-silk, (麻、细麻 布、粗麻布、细绸、细丝 线)(p.119) | hemp, fine and coarse cloth, fine fabrics, floss silk (麻、细布、粗布、 精细织物、丝线 丝)(p.15) | Hemp, good to poor quality matting, coloured silk, floss (麻、优劣不等的 编织材料、彩丝、 丝线)(p.92) |
|--------|--|--|--|---|---|

由上表可见,西方译者对《禹贡》所载九州农产品的译介不尽相同,除了彭氏翻译得较为简略,且漏译了“玄纡”、“縞”、“桔柚”、“菁茅”之外,其余三位译者均较为细致地译介了贡赋中的农产品。这些译本总体上都译出了原文的主要语义,但仍有个别农产品的译文与原文意义有较大差异。如对“匭”(杨梅)的翻译,麦氏将“匭”翻译成“篮子(baskets)”,理氏的注释认为应该是“箱子”(cases)^①,而高氏在比较了汉代经学家孔安国、郑玄以及许慎对“匭菁茅”的有关注释之后,将“匭”解释为“捆绑”等意,认为其是一种容器,翻译成了“碗(bowl)”^②,《说文》解释“匭”同簋,同古文机,《异物志》解释为:“杨梅一名机”,因此“匭”应为“杨梅”之意^③。再如,“织贝”被麦氏翻译成纺织的棉花(weaving cotton)^④,这也是不恰当的,应为“贝锦”^⑤,而高氏则翻译为丝线穿着的珍珠(silk-strings pearls)。又如,麦氏竟然将“菁茅”翻译成“露兜树”(pandanus)^⑥。这些讹误也是翻译中难免的现象。

除了彭氏译本并无有关文本的详细注释之外,其余三位译者则分别在各自有关注释等副文本中通过介绍和引用中国历代学者的有关注解,较为细致地传译了古代中国九州的土壤、农业生产等情况,这些诠释使得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景象得到更为丰富、真实的描绘。在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译文中,麦氏、理氏都通过各自译文内的注释补充介绍了有关文本,其中麦氏的有关文内注释,主要依据宋代儒学大师朱熹的弟子蔡沈的《书集传》的注释,而理氏则综合了诸多中国学者的有关注解。高氏在译文翻译之前,独立刊行了其认为难懂的词语的注释,在这些注释中包含着其对有关文本意义的科学考据与比较研究。

三、《禹贡》所载农业知识的西传影响

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同时期,《尚书·禹贡》等中国古代经典文本随着西人的译介而不断地西传,其中所载中国古代农业的有关知识和经验也逐渐为西人所研读、借鉴,对西方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早期的西传影响

早在17世纪,《尚书》即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们作为教材之一来学习与译介,西方的主要汉学著述对这部重要的古代经典的介绍与引用,对中国农业有关状况的描述,都使得西人对中国农业及其技术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禹贡》中关于中国古代君主重视农业生产、平治水土、制定历法、指导农民根

① James Legge. *The Shoo King or The Book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116.

② Bernard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48, No. 20, 1947-1948, p.152.

③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55页。

④ W.H.Medhurst. *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1846, p.98.

⑤ 江灏、钱宗武译著:《今古文尚书全译(修订版)》,第54页。

⑥ W.H.Medhurst. *The Shoo King, or The Historical Classic: Being the Most Ancient Authentic Record of the Annal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anghai: The Mission Press,1846, p.100.

据土地和时令进行农耕活动,以及农业制度等记载译成西文之后,中国的农业专著如《农政全书》等大量传入欧洲,中国古代的农业思想和实践引发了西人对其社会现状的思考,对西方当时的政治、经济等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18世纪,欧洲农业处于停滞状态,欧洲人只是通过耶稣会士和其它旅行者传递回的信息,才得以了解和运用中国先进的农业知识。正是中国丰富的农业范例“才使欧洲农民从几百年的麻木不仁中惊醒过来,引起了欧洲的一场农业革命,并最终引起一场经济和产业的革命。”^①

18世纪以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魁奈(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为首的重农学派赞扬中国的农业制度:农业在中国得到尊崇,务农者总是得到皇帝的特别关注。他曾介绍过中国古代舜帝保障农业生产的法令,还将尧帝把帝位禅让给一位青年农民作为例子。有关思想和实践在《禹贡》等诸多文献中都有所记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18世纪中期“农村、农业问题日益严峻、矛盾日益尖锐的法国,由传教士介绍而来的中国政府的亲农重农政策对于法国社会会带来多么大的冲击力,由此不难想象。”^②从魁奈的有关思想,如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寻求一种符合“自然法则”的经济秩序原则,以及通过改革,让农业衰退的西人回归原始纯真的自然状态等,都可看出中国古代农业对其的重大影响。法国重农主义主张增加农业投入、实行适度赋税制度的理念,也与《禹贡》所载国家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制定赋税等级的思想相契合。在重农思想鼎盛时期,1768年春季,法国皇太子曾仿效中国皇帝参加春季籍田大礼,拿起一副小耕犁模型,以示对法国农民的重视和同情。次年,奥地利的约瑟大皇帝也用一副真实的耕犁耕种了一块土地^③。虽然重农主义者的改革最后由于诸多原因而失败,“但是‘中国热’的遗产在欧洲的土地上依然被保留了下来。”^④不但中国丰富的农业知识如桑蚕养殖、纺织技术等,逐渐西传而为西人所学习、效仿。中国的诸多农用器具也随着农业知识的西传而很快为西人所知晓与使用。例如“中国的谷筛于1727年传到了法兰德斯,1730年传遍了法国。同一时期,中国的犁也传到了欧洲,中国的花草和嫁接技术也引入了欧洲,使十八世纪欧洲的园圃面貌大为改观。”^⑤

(二)19-20世纪的西传影响

19世纪,随着西方殖民贸易的扩张和基督教的海外传播,西人需要对东方大国中国的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在这种氛围中,英国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麦都思首次将中文《尚书》翻译为英文,并将中国学者有关古代农业知识经验的注释译介到西方。其后二十多年,英国传教士学者理雅各经过更加深入的研究,再度英译《尚书》。二者的翻译都带有丰富的注释,理氏翻译的注释尤其厚重,通过注释,中国农业有关水土、桑蚕、赋税等知识得到了更为详细、全面的译介,较之早期译介,译文准确性大为提高。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语言学的发展,中国的诸多典籍文本成为西人研究汉语言的历史语料。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于20世纪中期英译了今文《尚书》,使得《禹贡》所载农业知识得到更为准确的西传。19-20世纪,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盛行,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不再是之前繁荣富强得令西人仰慕而感到需要学习、模仿的目标,甚至中国的历史和文明也被西方贬低与轻视。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西传的农业知识客观上仍然为西方的有关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三)当代的西传影响

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又一次把探究的目光聚焦于这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重新关注、研究中国的文化典籍,试图从中寻求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根源。此时期,英国

(下转第78页)

① 冷东:《中国古代农业对西方的贡献》,《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

② 王银泉:《中国农业的“中学西传”与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学海》2010年第3期。

③ 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④ 王银泉:《中国农业的“中学西传”与法国重农思想的兴起》,《学海》2010年第3期。

⑤ 冷东:《中国古代农业对西方的贡献》,《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